

# 陈绛先生访谈

采访时间：2012年3月19日下午

采访地点：上海吴中路海联花苑陈宅

被采访者：陈绛

采访整理者：林志宏，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员

张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陈绛，字墨孙，1929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伯祖父系前清末代皇帝溥仪的师傅陈宝琛。194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1950年提前毕业，进入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工作。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开始从事经济史研究。“文革”期间被下放到黑龙江呼玛县兴华公社。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担任1977级班主任和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83年作为富布赖特资深学者访问美国。晚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第二、三届上海市经济史学会会长，并任《近代中国》主编。合著有《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等，译有《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编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轮船招商局》，有《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等学术论文。



陈绛先生与林志宏助研究员交谈（张鼎拍摄）

[整理者按]陈绛先生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工作期间，受嘱撰写自传，欣然起笔写下《八十记愧》，将其人生历程略述已毕。<sup>①</sup>故而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偏重于一些《八十记愧》中未曾细说甚至遗漏的细节往事，对此陈老逐一娓娓道来，为我们讲述了他八十多年的人生故事。现将采访材料整理发表，注释为整理者所加。

## 一 我的旧居“三坊七巷”

我祖籍福州市螺洲乡，出生在福州市区郎官巷，它属全国著名的街区“三坊七巷”。<sup>②</sup>“三坊”和“七巷”像鱼骨头的形状坐落在福州市南后街两旁。关于“三坊七巷”，2011年12月福州召开“三坊七巷与台湾”研讨会，我应邀参加，谈到当地大家望族后代移民到台湾，以及彼此联姻关系，报纸

①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馆员传略》第7辑，2009年。

② “三坊七巷”分为东、西两部分。向西三片称“坊”，向东七条称“巷”，自北而南依次为：“三坊”包括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包括杨桥巷、郎官巷、安民巷、黄巷、塔巷、宫巷、吉庇巷。

上已有报道,<sup>①</sup>这里不再重复。不过,要强调的是,“三坊七巷”本身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但近代不少名人如林则徐、沈葆桢、严复居住这里,这里还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和著名作家谢冰心的旧居。林觉民在黄花岗起义牺牲后,原来住的房子,就由谢冰心的父亲买下来。在我小时候,“三坊七巷”中的南后街有很多裱褙店,记得起的有米家船、青莲阁等。每当放学后,我和几位同学常常沿街边走边谈,从鼓楼前走到南门兜,又回头走,往返反复,看到店里墙壁上装裱的书画,便进店内观赏品评一番。除了裱褙店外,那里的旧书肆也很多,像聚成堂,店中有许多旧书刊,特别是线装书堆满店堂。我曾经在这家书肆买过一套《古文析义》和一部《综合英汉大辞典》,这部旧词典今天已经过时,但其中一些当时的译名,对我后来翻译英文中国近代史著作仍然很有参考价值。今天,南后街已经变得非常商业化了,原来众多的裱褙店和旧书肆已不再见到,取而代之的是卖福州特产鱼丸、芋粿之类的点心店和出售印章、漆器之类的手工艺品商店。

## 二 求学背景及知识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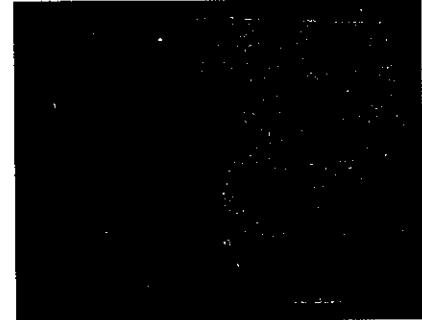
问到我的求学历程,我在《八十记愧》里已经大抵写到。在这里,主要想谈谈中学阶段一些知识来源。我不太理解,为什么现在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这么重,升学压力这么大,我们那个时候却是很轻松的,可以随意大量地阅读课外书籍。记得高中时学校里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古今中外,应有尽有,称得上“万有”,全部开架,可以自由取阅,我当然不可能本本精读,但随便抽取翻翻,却也增进了不少“目录学”的知识,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有伍光建翻译的西方名著,如大仲马的《侠隐记》。少年的我十分喜欢巴金的作品,他那流丽激情的文笔,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对大家庭状况的描画,引起我的共鸣。我曾用在福建报刊发表文章的平生第一笔稿费买了开明书店出版的巴金《灭亡》和《新生》两部小说,它们是我记忆中买的最早两本书。此外,《鲁迅全集》也是我在中学时期读过的。这套《全集》是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而出版,我记得是红色封面的精装版,福建省图书馆里有一套,我家离省图书馆很近,几乎天天去省图阅读,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当时年少,没有社会阅历,只欣赏鲁迅文笔辛辣犀利,对其杂文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实际意义并没有体会。上述是我在学校和课外汲取的知识。其次就是在家庭教育方面。当我进入中学以后,每年暑假寒假,父亲都教我读《四书》和《五经》中的《诗经》、《书经》。坐在父亲的书房里,他讲解后走开,拿二三十枚铜板,放在左边,叫我每朗读一遍,拿一枚放在右边,等到铜板从左到右全部拿完,书也就读完,可以背诵了。抗日战争时期,福州曾经短暂沦陷,我就读的福州格致中学内迁到福建、江西两省交界之处。父母亲没让我去,于是留在家里,跟两位老师补习。一位教英语、数学,一位据说是前清举人,跟他读《四书》、《左传》和《古文析义》,也就是前面提到我在南后街旧书店里买的那一部。我不懂得那位老师为什么不用《古文观止》这一通行的读本,而要采用林西仲的《古文析义》。老师要求每星期用古文写一篇作文,由他批改,作文的题目一篇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一篇的批语是“左宜右有”,我觉得很符合我的中庸平和的性格。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红楼》和《水浒》,每年假期我都会读一遍,《西游记》和《封神榜》我不大喜欢,就没有多读。家里藏书多,我发现房间里有一张方桌几个抽屉里都是民国初年广益书局出版的各种小说,如《三侠五义》、《花月痕》、《九尾龟》,以及《阅微草堂笔记》、《两般秋雨盦随笔》等,猜想是父亲从日本回国路过上海时带回来的,本本崭新,没人翻阅过,我常常私自拿来躲在床帐里看。厅堂角落堆了一叠《小民报》(福州流行的一份小报)合订本,同学杨佩霖家中有整套《论语》、《宇宙风》、《语丝》等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杂志,也都消磨了我的许多年轻岁月。我求学时代,私塾早已没有了,但是我从补习老师和父亲受到的教育,使我对古汉语的掌握比起一些只受现代学校教育的同龄人要多一些。

<sup>①</sup> 《陈宝琛侄孙、著名历史学家陈绛:福州四大家族与台湾板桥林家、鹿港辜家联姻成戚,闽台血脉凝成三坊七巷一世家》,《福州晚报》2011年12月13日,A5版。

整体说来，我一生的知识渊源，受到家庭的影响特别深刻。

高三的时候，我开始向福建《中央日报》副刊投稿。时任副刊主编周问苍，是地下民盟盟员，这是我不久前读到福建省文史馆馆员志才知道的，当时并不认识他。虽然我是自发投稿，却常常被采用；至于写些什么，今天大多已忘。只记得翻译过一篇英文课本上的小说《是他来吗？》和雪莱的《小夜曲》，还写了一篇《关于〈大学〉作者问题》的与人商榷文章。以当时自己浅薄的国学常识，竟然敢写那样的文章，真是少年气盛，不知天高地厚。

1947 年到了上海，考入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首先给我的感受，它是一所完全西化的大学；求学期间主要的收获就是加强了我的英文训练，学校要求日常举止都要符合西方“绅士”的规范。英语是校园语言。入学不久，注册处给我一张通知，规定此后在校就读期间必须使用韦氏拼音的英文姓名。学校布告栏上张贴的全部是英文，如入异域。我在最后一学期选修一门中国地理，教授用英语讲授，印发的讲义上的地名也都是韦氏拼音，没有汉字。我们毕业的时候，由董事长颜惠庆<sup>①</sup>授予学士学位证书，毕业证书也是用花体英文印制，这应是圣约翰大学有史以来用英文颁发的最后一届毕业证书，因为 1949 年以后几届，就不可能再用英文发证书了，到 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约大被取消。现在我的毕业证书上，还留有颜惠庆的签名及学校的钢印，也可以算是一件见证历史的文物吧！



陈绛先生圣约翰大学毕业证书

### 三 解放初期在上海的境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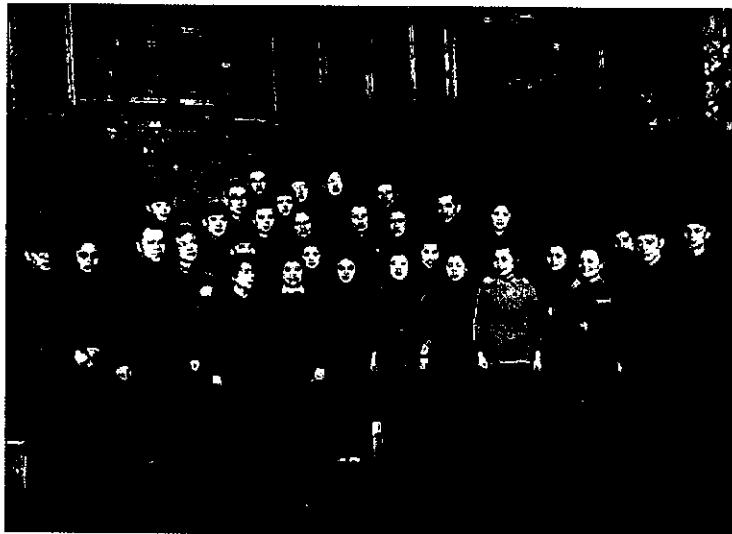
1948 年底到 1949 年初，时局十分混乱，许多同学都已离校，无心上课。5 月底，上海解放，更激发了许多同学的革命热情，纷纷“北上”、“南下”。“南下”的同学是跟随解放军打到福建去，而“北上”的同学则到北京参加华北革命大学，很多人后来分配到外交部门。我因为毕业还缺 6 个学分，就读了学校的暑期班，选两门课，修满学分，于 9 月毕业。毕业不久正好看到报上刊登广告，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招生，便去报考，幸被录取。那时研究所和现在的不一样，带有培训班的性质。主要目的是培养财经方面干部，以应建国初期百废待举的迫切需要。

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大约有 100 人，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有西南联大毕业的，也有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不少人早已踏上社会，有了工作。我记得有两位同学入校之前曾在航空公司上班，当然也有一时失业的，都报考上了研究所。所以，我们这一届同学的年龄相差很大。我的年龄最小（当时 21 岁），和我同龄的有三四人，都是刚从大学毕业；年纪最大的一位，他的女儿已经和我一样大。在经济研究所学习还未结束，我就提前被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工作，毕业证书还来不及拿，是后来补发的。为什么提前毕业调到统战部？这是跟所长许涤新有关系。<sup>②</sup> 许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研究所就是在他的倡议下成立的，他当时还身兼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工商局局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工商处处长。我们五六个年纪轻的学生，便因他关系调到统战部。

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和上海市委统战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部长是陈毅，不久

<sup>①</sup> 颜惠庆（1877—1950），字骏人，上海人。曾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清朝驻美使馆参赞。1909 年任外交部股长。1912 年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长。1920 年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后改任内务总长等职。1926 年春，曾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

<sup>②</sup> 许涤新（1906—1988），经济学家。广东揭西棉湖人。1926 年后，先后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劳动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武汉、重庆《新华日报》编辑，《群众》杂志主编。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统战部长，华东财委和上海市财委副主任、市工商局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汕头大学校长等职。是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华东局统战部全体工作人员及中央统战部来沪调研人员合影。

1951年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

前排左二周而复,左五任佩仪,二排左一陈绛。

由潘汉年继任,周而复是秘书长(后升副部长),<sup>①</sup>主持日常工作。

周而复是我走上工作岗位接触到的第一位工作领导。我觉得他与其说是共产党高级干部,倒不如说更是个文化人。当第一天我们从江湾复旦到苏州河畔百老汇大厦(现为上海大厦)报到时,周下来接我们上楼。他穿着夏天两用衫从电梯里出来迎接,很和气地领我们上楼。他对我们说,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统战工作方面“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两点。平日工作之余,有时晚上他带我们到百老汇大厦后面小街,吃小笼包、鸭血线粉汤之类,甚至有次自己开车带我们到大世界附近吃郑福记酸梅汤。总的来说,周这个人没有什么官气,是一个很随和的人。而现在有些人一旦有了一官半职,便摆官架子大不同。我和任佩仪结婚时,他送给我们一部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晚年却遇到了麻烦。1985年10月,周而复率领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里有人先他回国,向上反映,说周在访问日本期间,参拜靖国神社,在一些正式场合,对待日本主办方态度傲慢。还说他在宾馆内收看淫秽节目,到药店打手印买春药。当时中央正在抓高级干部涉外工作中违纪的典型,1986年3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中纪委决定开除周而复党籍》的报道,周遭此厄运,媒体上就没有声音了。上世纪80年代中我自美国回国,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去看他,我对他说:“周部长,上海传说你自杀了。”他告诉我事情的原委,此事他在《往事回首录》中已有申说,我就不再谈了。他伸出五个手指说:“你刚从美国回来,你知道西方买春药要打手印吗?”团里有人在访日期间,犯错被周批评,心怀不满,恶人先告状。晚上他请我和时调北京的原统战部秘书科长薛若梅到松鹤楼吃饭,席间我们问他:“你怎么不提出申诉呢?”周而复毕竟有政治经验,他知道他被处分牵扯到党内纷争,当时正在抓党风建设,既然是高层点的名,申诉未必有用,但他的副部长级待遇未变,有些职务也都仍保留。他就闭门家居创作长篇巨著《长城万里图》。他引我到书房,里面有很多大陆和港台出版的关于抗战历史的书籍,都是为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写作所作的准备。后来他向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提出申诉,终于恢复了党籍。2004年周而复逝世后,他的几个旧部属选择在北京举行送别仪式的同时在上海青松城举行追思会,我也参加了。会议中间,北京方面打电话来,传达了最后定稿的对他的悼词,肯定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对于那

① 周而复(1914—2004),原名周祖式,安徽旌德人。1933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在延安、重庆等地从事文艺和编辑工作,193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夜行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文化部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晚年有百万字回忆录《往事回首录》。作品有《上海的早晨》、《白求恩大夫》、《燕宿崖》等。

个处分只字未提。他在天之灵或许可以得到告慰吧。

扯得远了，还是回头谈谈初到统战部的情况。那时部里工作人员很多都是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员，属潘汉年情报系统，对上海情况十分熟悉。我分配在秘书处调研科，科长潘子康，广东人，上世纪30年代的老党员，喜欢文艺，和左翼电影演员陈波儿等都很熟悉，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角原型李白被捕时就住在他的楼下。我主要担任内部文字工作。由于上海刚解放不久，每个礼拜，统战部都要开一个研究私人工商业界情况的小会，由许涤新主持，召集上海有关部门的党委负责人，像工商局、人民银行、市工商联等六七个人，汇报上海工商界动态和问题，商量研究对策。这种会议可以说是上海高层次的内部财经会议，我常常被叫去担任记录，也因此了解到一些上海工商界上层人物，像荣毅仁、刘鸿生、胡厥文、刘靖基等和他们企业的情况，这对我以后研究上海经济史有很大的帮助。市人代会、政协会期间各小组讨论记录也多叫我综合整理。当时统战部有一份内部刊物《反映》，便是摘要登载这些会议记录，以及上层人物动态。编好后送市委印刷厂排印，送到市委领导和有关负责人手里。日后我在上海档案馆目录里看到藏有这份内刊。

当时我们工作在百老汇大厦十一楼，宿舍在十二楼，市外事处和交际处都在楼下。平时吃住都是在大楼里。机关气氛愉快和谐，像个大家庭，大家都沉浸在人民共和国新生的欢乐之中。部里自发成立一个俱乐部，下班之后打乒乓球、康乐球（解放初期最流行的一种文娱活动），每星期还请人来教唱歌，有时周末举行舞会，陈毅等一些领导人也来参加（柯庆施主政上海禁舞后，舞会便销声匿迹）。当时潘汉年的妻子董慧担任统战部秘书科科长（后为工商处副处长），她为人热情直爽，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市长夫人的架子。刚从大学毕业调到部里的任佩仪，就是在她怂恿下同我结婚的。可惜这种愉快的气氛没有维持多久，只有三四年而已，1954年发生了“潘杨冤案”。统战部科长以上中层干部大多失踪，后来才知道是被隔离审查，甚至判决入狱。来了一批山东工农老干部接替上海地下党员，来了大换班。接着“肃反运动”开始，一片肃杀之气，人人自危。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不妨一说。1950年代初反美扶日中，周而复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去作一次演讲。周要我去查些资料，为他准备演讲稿。我从杂志中看到一则有关从事台独活动的廖文奎、廖文毅兄弟的资料，我摘录在笔记本上。他们检查我的笔记本，发现这两人的名字，追查我同他们的关系，我说这是从杂志里抄来的，不信可以查，那时候年纪轻，记忆力脑子好，记得抄自《世界知识》，然后他们要我带（实际上被押解）去卢湾区图书馆，幸亏终于查到，才弄清了问题。

我们1953年结婚后，分配住在巨鹿路宿舍，这是原亚细亚洋行职员的宿舍，一栋小洋楼。附近常熟路有几家旧书店，当时西侨撤离回国，出卖许多西文书。我常常去淘书，专门拣美国《现代丛书》（Modern Library）和英国《人人丛书》（Everyman library）、《牛津经典》（Oxford Classics）中的世界文学名著，各有十几、二十多本，每本只有一元，有的只有五角；还买到牛津本和剑桥本的莎士比亚全集，牛津本扉页还有曾国藩女婿、上海道台聂缉椝的藏书章。每本也不过3元。我还常到福州路旧书店挑选鲁迅著作的初版本。以当时十分微薄的津贴，买书癖好都得到佩仪的支持。回想当时淘书之乐，真如白头宫女话天宝。

解放后我的工资变化经历三个阶段，分别是供给制、包干制和薪给制。解放初期，我以为刚毕业就分配到市委机关工作，已经是幸事，国家有困难，我和任佩仪都拿供给制，觉得很光荣，心甘情愿，所有吃穿用品都由国家提供，每个月只发给两块钱，后来实行“包干制”，钱多给一些，但是衣物就不再提供了。改包干制后，我们已有了两个孩子，每个孩子可以请一个保姆，每个保姆公家发给二十多块钱。手头宽裕些了。领导曾主动问我不要改成薪给制，我说不要，坚持继续拿包干制，结果一直拿到1957年全国都取消包干制，才改成薪给制，年轻时怀着爱国热情，青春无悔，现在回想，不禁莞尔。

#### 四 在上海经济研究所的岁月

如上所说，潘汉年事件后，统战部已不再有建国初期那种愉快的气氛，我也就不太愿意继续待

在机关里。正好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作了鼓舞人心的《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决定在上海设立经济和历史两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由于考虑到自己毕业于复旦经济研究所，便向部里提出希望“归队”，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获得同意。事后回想起来，应该庆幸这一调动。统战部一位副部长刘人寿离休后也不止一次对我说：“你调出统战部调得对了。”当时部里有一位同事吴纪慎，刚从上海中学高中毕业，他在部里年纪最轻，平时喜思考，部里的同事们都昵称他“小恩三”（上海俗语）。他的父母都是革命烈士，但即使是这样革命家庭长大的优秀青年，也被打成了右派，更何况我这个非共产党员，还有“反动的”家族背景，复杂的社会（海外）关系。我曾和吴议论，《国际歌》唱“从来没有救世主”，怎么到了《东方红》，变成“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种言论如果被揭发出来，右派的帽子肯定是躲不过去了。后来知道当时有个规定，每个单位都分摊一定比例的右派名额，所以一定要有人顶上去。听说复旦经济研究所同学洪文达<sup>①</sup>和助教苏绍智，<sup>②</sup>后来都在复旦经济系工作。苏是党支部书记，对洪说：“系里右派名额不够，请你顶上去吧。”洪不明就里，没想到后果的严重性，就贸然答应，结果给打成右派，吃了多年苦头。平反后，洪文达曾担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

1957年夏，我充满憧憬带着调动工作的介绍信，来到了上海经济研究所，开始了另外一段人生历程。成立人文研究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研究人员，二是图书资料。经济所许多研究人员都和我一样，是从各个部门调来的。经济所除了几位应届大学毕业生，还有从劳动局（姜铎）、银行（汪熙）、《解放日报》（黄苇）、工商联（徐雪筠）调来。我的姑妈陈懋恒<sup>③</sup>和她的丈夫赵泉澄，<sup>④</sup>就是在历史所建所时入所的：赵泉澄姑丈后来被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姑妈“文革”中在里弄被强迫劳动，不幸下楼跌死。

图书资料方面，当时聘用两位行家——经济所的范平镐和历史所的杨康年。范是交通大学管理系毕业，对于有关经济方面图书资料相当熟悉；杨以前曾在上海旧书店工作，是古旧书籍的行家。他们到各处旧书店去看书、买书，有时整个书架买回来，两个研究所资料室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他们都已去世，两人筚路蓝缕，创始之功，令人怀念。

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是沈志远，<sup>⑤</sup>副校长吴承禧、<sup>⑥</sup>黄逸峰。沈、吴两人都是著名经济学家，后来都被打成右派，沈后来自杀，但秘而不宣，对外佯称病逝（沈志远逝于1965年1月）。主持日常工作

① 洪文达（1923—），安徽泾县人，1956年9月起执教复旦大学，任经济系副教授。1980年起任世界经济系教授，1986年批准为经济学科博士生导师。校内先后兼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4—1988），世界经济系系主任（1985—1992），经济学院院长（1987—1991）。

② 苏绍智（1923—），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历任复旦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兼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主编，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经济组组长，英国牛津大学，美国马凯大学、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以色列希伯莱大学访问教授。现任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

③ 陈懋恒（1901—1969），陈宝琛弟陈宝瑨之女，字稚常，又名珊，号荔子，福州螺洲镇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谙经典史籍、易学，能背诵十三经中的十一经，工诗词骈文，尤擅文史，通琴棋书画。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顾颉刚和钱穆。先后执教于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上海美专等。被顾颉刚誉为“一代才女”。

④ 赵泉澄，毕业于燕京大学，在校期间任校学生会主席，师从顾颉刚和钱穆，历史学家，著有《清代地理沿革表》等。

⑤ 沈志远（1902—1965），浙江萧山（今属杭州）人。中学时代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参加中共。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后又进入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生。其间参加《列宁选集》的中文版编译工作。1932年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中央文委委员。任教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商学院。1933年脱离中共。1944年加入民盟，1949年作为民盟代表参加《共同纲领》的起草，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担任中央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顾问、国家出版局编译局局长。民盟上海支部主任委员。著有《黑格尔和辩证法》、《新哲学辞典》、《计划经济学大纲》、《近代经济学说史》等。编译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创办、主编《翻译通报》、《理论与现实》等刊。

⑥ 吴承禧（1909—1958），安徽歙县人。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兴业银行襄理、副经理。抗日战争期间参加筹办《经济周报》。1949年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计划处处长，上海财经学院教务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民盟中央和民盟上海市委常委，民建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委，上海市人民代表及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共党员。著有《中国的银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组织》等。

的是副所长黄逸峰。<sup>①</sup> 黄是多次入党、多次脱党的传奇性老革命，他接见我时，告诉我所里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上海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改造。除了政治经济学组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之外，有一个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研究组，下设三个小组，分别对三家历史悠久的著名企业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每组成员三四个人，他们后来出版恒丰纱厂、大隆机器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三家厂史，以“重视典型调查”而受到《红旗》杂志表扬。还有一个研究组，以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解放后社会主义改造为对象，由黄逸峰亲自挂帅。我因为在统战部工作过，被分配在这个组。黄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曾拟定一份调查提纲，将改造组分成四个小组，分别负责机电工业、医药工业、纺织工业和商业，按照调查提纲的要求，开始档案阅读和资料收集工作。

我负责纺织业，就去了外滩的市纺织工业局。当时我们小组内三四个人整天待在纺织局里一个狭小的房间翻阅档案。那时既没有复印机，更不知电脑为何物，全靠手抄笔摘，一笔一画地抄写，研究条件十分艰苦。在各业务部门查阅档案资料告一段落后，回所按照对资改造的时间顺序分工写作。各章提纲几经讨论，反复修改。黄逸峰就在我们的讨论中发表一些指导性意见。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不止一次引述百代唱片公司一位法国资本家访问中国后说过的话：“如果法国政府也采取中国这样的政策，我们也愿意将企业交给国家。”黄以此来强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和对资本家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正确性，以及和平改造的国际意义，这也成为全书写作的指导思想。各章竣工后，由我最后作文字上统稿，书名《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约30万字，书稿送到中共上海市委审查，当我们见到自己的劳作终于有初步成果而欣慰时，没想到姜铎<sup>②</sup>撰写的“结束语”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却出了问题。当时负责文教的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批示，指责此书“和平”气味太浓，下令组织批判。在所内批判中，有人指鹿为马，说宣传“和平改造”就是鼓吹“和平过渡”，而“和平过渡”正是当时遭到严厉谴责的苏联修正主义货色；甚至有人咬文嚼字，提出这本书的名称就有问题，应当是《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对”字，怎么显出工人阶级是改造者、资产阶级是被改造者呢？真是理论遇“左”倾，有理说不清。结果《改造》一书从此在劫难逃，长年累月不见天日。

1958年，上海经济和历史两个研究所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和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合并成立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有一段时期是两个牌子一起挂，既叫做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又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到了“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无形关闭，研究工作全部停顿。至1978年5月才正式复院，这是后话。

## 五 “文革”下放的经历

1968年年底，我被下放到奉贤海边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斗、批、改”。不久，上海市造

<sup>①</sup> 黄逸峰(1906-1988)，又名黄承镜，江苏东台人。学生时代即投入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通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全国铁总秘书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到苏北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历任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苏北参议会议长、中共兴东泰特区地委书记等职，抗战胜利后，历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交通处长、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等职。建国以后，历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组书记。后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院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院长以及市政协常委等职。

<sup>②</sup> 姜铎(1915-2001)，又名蒋立，江苏丹阳人。“九一八”、“一·二八”后投身抗日救国运动。1935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第五师旅政治部副主任、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共苏南丹阳、常州、镇江三城的地下工作特派员。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处长等职。1957年进入上海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员，研究重点是近代中国史。1981年离休，任该所特聘研究员。1958年主持编辑《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59年出版社刊印所著《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未正式发行)，60年代发表《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等三篇论文。与黄逸峰合作《中国洋务运动研究》、《如何正确评价洋务运动》。80年代后参与史学界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和洋务运动史讨论，修订补充《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撰写《略论旧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三代核心人物》。1993年发表《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并作自传《学生-战士-学者：我的人生三部曲》。

反派头头提出了干部“四个面向”，即面向工矿（称为“战高温”）、面向农村、面向边疆和面向基层。1969年11月1日，我和经济研究所郑菊生<sup>①</sup>等六位同事下放到黑龙江呼玛县兴华公社“插队落户”。全院一共去了二十多人，包括一位历史所的当权派（总支书记）、一位失宠的院造反派头头，都是由院、所造反派头头“钦定”的。在北站坐火车出发前，上海市革委会第三把手徐景贤来送行，同我们握手时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佩仪在旁一听，就觉得不妙，“奋斗终身”不就是说此去永远待在边疆，别抱希望再回上海吗？事实上，去前也没有明确下放期限，有没有探亲假，而是强调“扎根落户”。其实事后想想，下放边陲也好，至少可以远离上海这个喧闹纷争的是非之地。

呼玛是中国最北面的一个县，位居黑龙江畔、中苏边界，对江就是苏联。冬天气温可达摄氏零下四五十度，走出屋外呵气成冰。可能由于我们是干部的原因，不像插队知青要劳动记工分，平常不大参加劳动，空闲的时候就躲在房间里面，在炕上谈天说地，看看书。我去的时候只带了一本苏联外文出版局出版的恩格斯《反杜林论》英文版，这本书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汝信<sup>②</sup>在参加志愿军之前送给我的。为什么要带这本书？因为如果带的是古文或英文书籍，会被人指责“四旧”。但是带了这本书，仍然心怀忐忑。记得在“文革”中在经济所，有次我谈到：“我们研究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历史，应该读读马克思《资本论》。”一个年纪很轻的造反派马上批评我说：“有时间为什么不读毛主席的书，却要去读马克思的书？”我听了啼笑皆非，“左”毒使人思想僵化到这个地步，无话可说。后来有段时间“批孔批儒”喧嚣一时，出版了一些被列为所谓“法家”的著作，有的还选入《中华活页文选》，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我终于又有机会朗读、欣赏这些古文名篇，我利用公社的方格稿纸抄写几篇，装订一本，保存到现在。那一段时间，英文就读《反杜林论》，古文就读这些名篇，以这样的读书生活排遣在东北村居的枯寂。——我后来读到一些文化人回忆流放北大荒悲惨遭遇的文章，比起他们，我算幸运多了。

“文革”期间还有所谓“清队”，即清理阶级队伍。1972年7月至10月，兴华公社派我和郑菊生共同到牡丹江一带，调查一些社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这些人都是在“文革”时被“揪出”，罪名多为伪满汉奸、苏修特务之类，现在须落实定案，我们先后去了密山、宁安等县，沿途风餐露宿，行走原野，乘机还游览了镜泊湖名胜。走访调查的结果，发现他们其实并无太大问题。

在刚刚到达呼玛的一两年内，我们从未回过上海。后来政策放松了，我们几乎每年都有假期回上海。根据毛泽东5月7日的一个指示，我们当时就是所谓“五七”战士（我们诠释为一年12个月，在上海5个月，在呼玛7个月）。后来我们戏称自己为“倒五七”战士，在呼玛5个月，在上海待7个月。有的就一直称病待在上海，不回呼玛，也算是对“文革”的消极抵触。我是在1976年“四人帮”覆灭前夕落实政策，终于获准调回上海。

回到上海，最初临时安排在人民出版社。当时上海所有出版社都合并到人民出版社。叫做“大人民”。我在那里负责两本著作的编辑出版，一是《四次中东战争》，另一是《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文革”结束后，黄逸峰复出，主持上海社科院的重建，他和姜铎来我家，希望我回经济所。我由衷地感激他的盛意，但是犹豫不决。因为我虽然已在研究所工作十多年，却也没有多少成果，单是一份调查提纲就反反复复集体讨论了几个月，工作效率相当低。此外，在我去黑龙江后不久，经济所造反派来到佩仪任教的中学，以凶恶的口吻威胁、斥责她。本来她在学校里偷安无事，这时却引来校内红卫兵大幅标语贴在校门外马路上，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件事让她十分反感，耿耿于怀，再

① 郑菊生（1928—），浙江省鄞县（今属宁波）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统计系四年制本科，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专业三年制研究生班，接着先后在国家统计局、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等单位从事统计实务、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后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统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② 汝信（1931—），江苏吴江（今属苏州）人。中国当代美学家、哲学家。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55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曾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执行主席，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长以及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等。著有《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合著有《黑格尔范畴论批判》、《西方美学史论丛》等。

也不愿我回到经济所,和那些造反派共事。我只好带着愧疚的心情婉辞黄老,决定回到我读研究生的母校复旦大学。

## 六 复旦大学教学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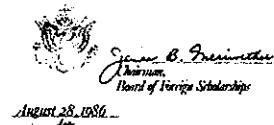
1977年夏,我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我原是学经济的,在社科院研究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什么不到经济系,而去历史系呢?主要是自己素来对文史的兴趣,要比对现实经济更为浓厚,原来经济所的老同事汪熙、<sup>①</sup>黄苇等人,<sup>②</sup>此时也都从社科院调入复旦历史系。双重因素下,我决定到历史系服务。我真正有一些浅薄的历史著述,是从进入复旦大学这一时期开始的。

复旦历史系是藏龙卧虎之地,我是半路出家,既没有传统史学素养,又没有受过西方严格的史学训练,一切从头学起,战战兢兢,好在过去做过经济史的研究,还能对付过去。过了一段时间,故乡有人传来消息,当时的系主任谭其骧先生<sup>③</sup>写信对我的堂兄陈矩孙说,<sup>④</sup>我在复旦可以站住脚跟了。

我在复旦历史系最先开了一门洋务运动史的选修课(后来为研究生开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课)。洋务运动和中美关系史是我到复旦以后三十年来的主要研究兴趣所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每隔两年举行的全国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我几乎都参加。在开课的同时,我还担任过1977级的班主任和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77级是非常优秀的班级,全班50名同学。他们都是十年动乱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求知热情非常高。1983年,复旦推荐我申请美国富布赖特奖金访问美国,我决定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我的堂兄陈岱孙<sup>⑤</sup>知道后,很高兴,因为哈佛是他的母校,费正清是他的旧识,他主动寄给我一封给费正清的介绍信,并且要我到哈佛后,在他当年住宿的楼房拍一张照片给他。关于访美的情况我在《八十记愧》中已经谈过,这里不再重复。我于1984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结束。回国后,学校考虑到我刚从美国回来,想要我去负责外国留学生工作,有个别年轻

### Fulbright Certificate

*awarded to*  
**Mr. Chen Jiang**  
for increas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rough academic achievement as a Fulbright Scholar



美国富布赖特奖状

① 汪熙(1920-),安徽休宁人。历史学家。1944年赴美,194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Warton)商学院研究生院。1948年返国后,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美关系史和国际经济关系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工商学院名誉院长。1992年10月起领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终身政府特殊津贴奖励。

② 黄苇(1923-2008),江西安义人。194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年7月开始任上海《解放日报》记者。1956年任上海《展望》周刊编辑组组长。1956年进入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返复旦大学任教,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上海地方史志学会副会长。

③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笔名禾子,浙江嘉善人。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1950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建立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后升级为研究所,历任历史系主任、历史地理研究所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八届政协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史研究和中国历史地图的绘编。

④ 陈矩孙(1913-1987),原名陈絮,福建福州人。1930年在福州英华中学参加共青团和反帝大同盟。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投身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在“一二·九”运动中是燕大的组织者之一。1934年参加中共。1938年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编辑部担任编译工作,后任刘少奇秘书。1940年返回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北平的学生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开北平,1942年回福建,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动员省主席刘建绪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社会部部长,1947年陈矩孙担任民盟福建筹委会6个委员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矩孙在省公安厅和有关统一战线的团体中工作。1954年被聘为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1957年后,连任福建省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与谭其骧是燕京大学同学。

⑤ 陈岱孙(1900-1997),原名陈总,福建福州人,我国久负盛名的教育家和经济学家。1920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先后留学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哈佛大学。先后任教任职于清华大学(1927-1951)和北京大学(1952-1997),长期担任法学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或系主任,国内首批博士生导师,任第二届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老师也来游说，说：“陈老师，具体工作我们来搞，你来就是了。”但我深知自己不是搞行政的料，就婉拒了这一职务。

我是1994年自复旦退休，翌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在《八十记愧》中说自己实际上是退而不休，《记愧》中已交代了前几年的退休生活。这两三年来我参加的中央文史馆2007年举办的第一届《国学论坛》，提交论文《从中学到国学——兼论国学的现实意义》，及后来的湖南省文史馆举办的《湖湘文化论坛》，提交关于左宗棠经世思想的论文，都是上海市文史馆决定我参加两个论坛而勉强写成应命。2010年11月，发现肠癌，在中山医院切除，术后作了一段化疗，现在我真正是退而休了。目前只是应交通大学出版社约，在堂侄女陈星协助下编撰先伯祖陈宝琛的年谱长编，列入该社《晚清名人人年谱长编》系列，病后正在收集资料中。

时间过得真快，弹指之间，我已到耄耋之年。回想后半生的教学生涯，我的体会首先是，为学要厚积薄发。我后来之所以能搞搞经济史，再从经济史扩展到中国近代史，主要依靠年纪轻时在家读了一些古籍，在教会学校又学到一些英文。我喜欢乱翻杂览，直到现在都还这样，老脾气改不了，乱七八糟，文史方面什么书都喜欢看，涉猎广泛，知识面也可就此拓宽（不过自然科学方面我知识浅薄，是个“科盲”）。比如说，研究洋务运动史，如果连外文都不懂，那还搞什么？

再者，晓得自己有一个脾性，做人做事，特别是做学问，都要认真对待，尽自己所能，力求完美，不可急功近利，草率从事。我曾经写过一篇《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最初在一次研讨会上，该刊一位编辑愿意发表。我说不行，他觉得很奇怪，说：“陈老师，别人来稿都是催着早发表，您反而不要早发表。”当时我考虑到还有一部分档案没有看完，我不放心，这样就推迟了两年才发表。又如，我还写了一篇《论晚清股市》，初稿提交一个相关的研讨会。后来有家刊物想发表，我希望等一等，因为我想翻阅《申报》，根据广告栏上股票行情做一个量化统计，没有把晚清股市行情摸清楚，怎么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论股市呢？这篇文章终于胎死腹中。我在复旦开洋务运动史课程，有学生建议我讲稿早就可以成书付印，因为那时史学界对洋务运动史研究还鲜有涉及，我说这份讲稿在课堂上讲讲还可以，还不成熟，后来洋务运动史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成果累累，讲稿也就没有发表的必要了。不久前我曾买到福建博物院编的《摇曳丹青——福建博物院藏扇面精品特辑》，其中有不少扇面是陈家——特别是我的伯祖父陈宝琛父子旧藏。我翻阅过程中，发现有一件题“陈铸海棠折扇面（1912）”，上款写明“壬子仲秋哉生魄写于都门之水月禅林寓所，子良四叔大人正之，侄铸”。我的曾祖父陈承裘，号子良，可是1912年他已经离世，而且子良是高祖布政公的长子，怎么会是“四叔”呢？于是我去上海图书馆查家谱，结果查到陈承裘在堂兄弟中排行第四，所以陈铸称他“四叔”，陈承裘于1895年即已去世，这里的壬子年应当往前推60年才准确，因此1912这个年份一定是搞错了。又如，前两年我校注清朝首任驻美使臣陈兰彬《使美记略》，查检地名原文颇费心力。陈兰彬到美国途经各个驿站，我都尽可能查出今译名，有些小地方，连英文《泰晤士地图册》都没有标明，我到上海图书馆查美国各州公路交通图，逐一校订。搞翻译，即使这个单词我知道，但还是词典不离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释。记得我从1997年开始，结合自己对洋务运动史的研究，着手翻译费正清等编辑、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0余年，这部日记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翻译的难度不仅在于它不是用现在通行的英语写作，还在于书中大量广东话汉语拼音和中国史实的回译，我前后花了四五年时间才将它译竣。书成之时，倍感欣慰，从而也坚定了我研究学术力求完美的态度和信念。

（责任编辑：素一）